

学林|资讯

◀ (上接5版)

经济持续景气,使工薪族群体不断扩大,收入亦大幅度增长。手握鼓起的钱包,上班族及其家属开始通过消费来构建自己的“新中产家庭”之梦。这个“梦”在当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拥有“三神器”!

在日本的创世神话中,所谓“三神器”是指源自天照大神的八咫镜、天丛云剑及八咫瓊勾玉。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在新兴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日本家庭心目中,战后昭和时代的“三神器”则变成了电视机、洗衣机与电冰箱。十年后,彩电、空调与汽车又成为了“新三神器”。自1957年后,日本民间消

费年增长率长期维持在8%至10%的高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新兴中产阶级拥抱物质文明的“消费革命”与产业技术进步一道成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场由新中产阶级引领的消费革命之所以能席卷日本,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国内贫富差距并未因经济高速增长而拉大,相反却是在不断缩小。这种日本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使大部分工薪族即中产阶层的收入趋于平等化,基尼系数稳步缩小。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国民生活民意调查”中,近9成受访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日本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已然成

形。这无疑验证了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的论断:工薪族阶层将会是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进而形塑当代日本社会运作模式。

然而,时过境迁,经历过泡沫经济破灭、长期陷入经济停滞的日本社会早已不是傅高义当年书中所描绘的那个模样。他在中文版的序言中亦坦承:“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笔者曾跟日本友人谈起《日本新中产阶级》最近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消息,他们也都大感意外。惊讶之余,不忘指出当下日本社会阶层与家庭结构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位身为职业女性的日本友人还特别向笔者强调:“丈夫工作,妻子在家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是一本“新”的旧书。诚然,这本写于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并不是了解当下日本社会的最佳读本,但依旧是研究形塑当今日本诸多社会现象肇因的理想工具。与此同时,正如傅高义另一本名作《日本第一》是在映射美国人对“日本模式”的思考与忧虑一样,50年前日本新兴中产阶级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和喜怒哀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应着今天中国新兴中等收入阶层的关切。小丸子一家的故事既能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同样也能出现或曾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千家万户中。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部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米沃什:波兰语诗人的20世纪人生

编译/黎文

1950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的波兰大使馆,文化专员切斯瓦夫·米沃什收到一封来自波兰作协秘书长的信。米沃什与秘书长相识多年,他们1930年代上大学时曾为同一本学生杂志撰稿,但两人日后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波兰文学的大人物对诗人说:“我听说你要搬到巴黎去了……我很高兴你会来这里,因为我一直为你担心:美国在物质财富上的辉煌是否掩盖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贫困。”

这封信的措辞礼貌、真挚,传递的信息却再清楚不过:在美国当了4年外交官的米沃什,已被认为不再值得信赖。他被调往巴黎,这样就可以回到华沙可控的范围。果然,圣诞节前几天,米沃什被召回波兰,护照被没收。

安杰伊·弗劳瑙塞克(Andrzej Franaszek)的《米沃什传记》(哈佛大学出版社,英译本)讲述了接下来的故事。被困在华沙的米沃什不知道能否再离开,再见到在美国的妻儿,并且也感受到了身边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倍感沮丧,精神状态十分不稳定。多亏朋友相助,他才得以脱身。1951年1月,米沃什到达巴黎。三十年后,他才回到波兰。

1950年的华沙召唤是米沃什命运的几个关键节点之一,他本会成为一个人,或者干脆就消失了。弗劳瑙塞克的书中详细讲述了多次类似的戏剧性召唤。米沃什1911年出生在立陶宛一个波兰裔贵族家庭,立陶宛当时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米沃什在人生伊始就被卷入了20世纪的漩涡。三岁时,一战爆发,为躲避德军,米沃什一家人成了流离失所的难民,穿梭在这片战争连年的地区:白俄罗斯、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米沃什晚年的诗里回忆了1918年的一段插曲,他和父母差点在火车站走散:

……遣返的列车开动了,要把我留在身后,直到永远。……我很可能就会成为别人,另一种语言的诗人,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在中东欧这片土地,米沃什这一代的数百万人,或是经历或是死于大大小小的战事:一战,立陶宛独立战争,波苏战争,纳粹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大屠杀,二战的东部前线从1941到1945年在这片土地上来回移动,战后又由苏联占领。米沃什的阶级和国家认



同都很复杂。他从小就说至少四种语言,尽管他的家族属于波兰士绅阶层,在立陶宛还拥有个乡村庄园,但他们和当时的大多数同学一样,都很穷。“我的物质生存状态是如此原始,以至于会让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感到震惊,”米沃什后来回忆说。

一战结束后,米沃什一家定居在维尔诺,也就是现在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作为一个没钱的贵族,和一个祖国是立陶宛的波兰裔,米沃什不能全心全意地接受任何一种认同。一战后波兰重新独立,经历了一阵沙文主义的骄傲,吞并立陶宛的部分国土,包括维尔诺。但米沃什被波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所排斥——他们对立陶宛人、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这些少数族群的敌意与日俱增。

在大学期间,米沃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他和几个左翼学生团体走得很近,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1937年,米沃什来到华沙,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

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米沃什觉得心智快崩溃了。任何人都能看到,波兰的未来会发生战争或革命,或者两者同时发生。多年后,他写道,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命运,“我有一种恐惧,一种基本的恐惧”。

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人们才能理解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米沃什做出的决定。在最初的混乱中,他逃离华沙,绕着弯路返回维尔诺,这给他暂时的自由,因为此时立陶宛

仍然独立。但1940年苏联军队进驻立陶宛,留给米沃什两个同样可怕的选择:留下,生活在正在清除和驱逐波兰知识分子的苏联;返回华沙,生活在不分青红皂白杀害波兰人的纳粹的统治之下。1940年7月,米沃什决定回到妻儿所在的华沙。

在华沙,米沃什活跃于地下文坛,编纂战时诗歌选集,将莎士比亚译成波兰语。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新的简单、直接和感伤——他的几部杰作,都诞生在这段岁月。

然而,他所目睹和经历的恐怖,永远塑造了他对人性 and 历史的看法。在《被禁锢的头脑》(1953)一文里,米沃什回忆了在纳粹占领的华沙的一个瞬间,那个时刻是一块试金石:

在一座四面楚歌的城市里,一个男人躺倒在机关枪战的街上。他看了看人行道,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鹅卵石像豪猪的毛一样直立。子弹打在鹅卵石的边缘,让它们歪了过来。意识中是否有这样的瞬间,是对世间所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检验。

米沃什想写的是能经受这类审判的诗。“在你印出一首诗之前,你该想想,这段诗是否能让至少一个人在与自己世界的斗争中使用。”没有什么比唯美主义更让他反感的了。在《论诗》(1957)里,他写道:“至少诗歌、哲学、行动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分不开的。我们想要有用处。”

身处20世纪,米沃什周围的人崇拜历史,也就是说,崇拜权力;但是艺术家崇拜真理,这是让他拯救自己灵魂的力量。

1951年逃离波兰后,他身无分文,没有朋友,而且面临重建自己世界的艰巨任务。妻儿应该和他一起去法国,还是留在美国,让他与妻子之间产生长时间的矛盾。

米沃什开始当记者,还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剧本。1960年,他已声名远播,因而被授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波兰文学教职。这里是他写作的理想地点。但是,在弗劳瑙塞克的叙述里,米沃什最讨厌在加州的生活:他在自然环境中体验到的快乐被他对这个文化的疏远和蔑视抵消了。在一封1964年的信中,他说:“当地人唯一的娱乐就是盯着过

往的汽车看几个小时,喝着酒,或是坐在车上把路牌当靶子开枪。”

他愤怒的根本原因,是感到与自己的语言和读者隔离,没有了这些,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生活毫无意义。波兰政府在他叛逃之后禁止了他的作品,尽管有家出版社忠实地出版他的波兰语著作,其中一些在波兰秘密流传,但是印量却很小:1953年的《日光》印了1000本,四年后还有320本没售出。直到1973年,他诗集的第一个英译本才出现。在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读者。

即使最终得到认可,个人的悲伤也使米沃什无法享受它。1970年代中期,妻子被诊断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卧床不起,直到1986年去世。同一时期,他的小儿子皮托患上了严重的躁狂抑郁,在汽车旅馆的窗口对着一个幻想的迫害者开枪,然后进了监狱。米沃什责备自己没有成为更好的父亲。

米沃什在生命最后阶段迎来了新的幸福。1981年,波兰解禁他的作品,米沃什凯旋,并意识到自己已成为波兰人的民族英雄,一个文化反抗的象征。1993年,他搬回波兰,和第二任妻子一起。这种回家的感觉,在他的大半辈子看起来都像天方夜谭。此后至2004年以93岁高龄离世,他都一直在写作。

米沃什持续一生的、对苦难的真切体会是影响他作品的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个人的苦难,还是与同代人共有的苦难。与20世纪许多伟大作家不同,米沃什的经历使他相信,诗歌不能让世界变得更黑暗,而是应该照亮它:

诗歌不可多写,只能勉强为之/在巨压之下,唯用希望/良善,而非邪恶,才以我们为其乐器。

这也正是米沃什对创造力的定义:创造力来自想要说出真相、表达真理的“内在需要”。虽然在今天,知识分子都已经开始羞于说“真相/真理”一词了。米沃什是罕见的文学和道德权威。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困境时,米沃什的诗歌和他的人生提醒我们,在20世纪存活下来,意味着什么,又需要什么。

(编译自Adam Kirsch“Czeslaw Milosz's Battle for Truth”,载《纽约客》5月29日刊)